

婁竝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
倭國在高麗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
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古代中日关系史

田久川

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
讚兄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
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大將



D829

田久川

古代中日笑集史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

1057

扉页题字 于植元

87.9.3/102

古代中日关系史

Gudai zhongriguanxishi

田久川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大连凌水河)

抚顺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3/8 字数: 22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辽宁师范大学书稿出版编辑室供稿、发行

责任编辑: 姜忠宽 李涵勤

封面设计: 达 野

责任校对: 曹明琳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1400·1 ISBN 7-5611-0035-3/K·1

定价: 2.20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古代中日友好交往的开端	(16)
第一节 一衣带水的邻邦	(16)
第二节 最初的交往路线和 中国文明向日本的传播	(19)
第三节 徐福东渡	(23)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中日交往和 中国移民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31)
一 倭人献见	(31)
二 汉帝赐印	(33)
三 秦汉移民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36)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39)
第一节 魏与倭女王国的友好邦交	(39)
一 倭女王国的兴起	(39)
二 魏倭邦交的建立	(44)
三 魏倭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	(47)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与倭国的交往	(50)
一 大和统一日本与朝鲜三国鼎立	(50)
二 晋倭邦交的断续	(53)
三 南朝与倭国的邦交	(5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	
	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60)
一	传播中国文化的汉族归化人	(61)
二	汉字和汉文典籍东传日本	(68)
三	天文历算科学东传日本	(71)
四	佛教东传日本	(73)
第三章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大发展	(79)
第一节	隋代中日邦交的新局面	(79)
一	小野妹子访隋	(80)
二	裴世清访倭	(84)
三	第三次和第四次遣隋使	(88)
四	隋倭邦交的重大意义	(90)
第二节	唐前期的中日邦交	(97)
一	唐日邦交的建立	(98)
二	大化改新及其以后的仿唐改革	(101)
三	初期遣唐使	(103)
四	唐日白村江之战	(108)
五	唐日友好邦交的恢复	(111)
六	遣唐使高潮的出现	(114)
第三节	唐后期的中日邦交	(119)
一	从遣唐大使到在唐大使	(121)
二	大历年间的唐日交聘	(125)
三	最后几次遣唐使	(131)
四	遣唐使的发展阶段及有关情况	(139)
五	渤海与日本的往来	(148)
第四节	唐日经济文化交流	(151)
一	唐日贸易	(152)
二	唐朝先进生产技术在日本的推广	(154)
三	晁衡留唐与鉴真东渡	(157)
四	唐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162)

第四章 五代宋元时期的中日国家

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190)

第一节 吴越两宋与日本的国家关系····· (190)

- 一 吴越与日本的国家关系····· (191)
- 二 北宋与日本的国家关系····· (192)
- 三 南宋与日本的国家关系····· (196)
- 四 辽金与日本的关系····· (198)

第二节 蒙元与日本的国家关系····· (199)

- 一 蒙元通使日本····· (200)
- 二 元军侵日····· (204)
- 三 战后元日两国的敌对关系····· (210)

第三节 五代宋元时期的中日贸易····· (212)

- 一 五代北宋时期的中日贸易····· (213)
- 二 南宋与日本的贸易····· (215)
- 三 元日贸易····· (216)

第四节 五代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218)

- 一 日本僧人来华····· (219)
- 二 宋元僧人入日····· (223)
- 三 宋元佛教宗派在日本的影响····· (226)
- 四 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和五山文学的兴起····· (229)
- 五 五代宋元时期的中日艺术交流····· (234)
- 六 五代宋元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在日本的传播····· (235)

第五章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的

中日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241)

第一节 明前期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241)

- 一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防倭措施····· (242)
- 二 明日建交与倭寇的中衰····· (246)
- 三 明日邦交关系的发展····· (250)

第二节	明后期中日关系的恶化	(253)
一	朝贡的停止	(254)
二	倭患的解除	(257)
三	明日朝鲜战争	(259)
第三节	明日经济文化交流	(266)
一	明日贸易	(266)
二	明日两国僧人的往来	(270)
三	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	(271)
第四节	鸦片战争前的清日关系	(273)
一	南明与郑氏政权同日本的关系	(273)
二	清日贸易	(275)
三	清日文化交流	(276)
第五节	中国人在日本研究方面的新成就	(286)

导 论

一 中日关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与日本两千余年间国家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发生发展的历史。

在遥远的古代，日本列岛曾经与亚洲大陆连结在一起。当和，在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境内都有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生活着。直到1万年前左右的全新世之初，第四纪最近一次冰川期基本结束，气候转暖，海面回升，加上地壳变动，东亚大陆边缘前曾出露成陆的大陆架和沿海地带渐被海水淹没，日本列岛终于完全脱离大陆，隔东海、黄海、日本海与大陆东西相望。此时，大陆和列岛上的远古居民都先后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

中国与日本被浩渺的大海无情地隔开了。但相对说来，它们之间还算离得不远：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最近处相距400余哩，而其南端的先岛群岛与中国台湾岛则仅距百余哩。所以，人们常说：“中日（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特别是两者之间又有朝鲜半岛恰为桥梁，双方往来更添方便条件。于是，早在先秦时代，大陆上一些勇敢的中国人便开始通过朝鲜半岛，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渡入日本列岛；当然，也有从列岛西入大陆者。其后，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实践经验的增多，一条条新航路次第开辟，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便日益频繁起来。

公元前3世纪末叶至公元3世纪初叶，中国秦汉王朝迭兴，

国家统一，势力强盛；日本列岛部落众多，小国林立，常相攻伐，亦渐有新兴强国出现并开始统治周围小国。这一阶段有成批的中国人先后移居日本，而日本诸国亦纷纷与中国通交；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对国家政权出现不久的日本社会给予很大的推动。中国史籍中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和倭人献见、汉帝赐印等记述，都反映了上述史实。尤其是“汉委奴国王”印的出土，更可证明中日之间至迟在公元57年已有国家间的正式交往。

公元3世纪初叶至6世纪末叶，中国封建国家长期分裂，而日本却由大和国完成了统一（约在4世纪末）。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三国魏与邪马台国的邦交极为亲密，以致出现了中国向日本派出正式使臣和倭王上表答谢恩诏的情况。两晋时期，中日交往因受日本国内外形势及中国政局等影响，一度处于低潮。但南北朝伊始，刘宋与倭国的邦交活动便又迅速形成高潮，五代倭王先后多次遣使南朝奉表贡献，求封官爵，直至南朝晚年始渐衰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中国移民直接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种植、养蚕、丝织、制陶等生产技术；日本方面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更加广泛地吸收中国文化，大和朝廷已能熟练使用汉文字。汉字以及儒学、佛教传入日本，无论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还是对中日关系史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隋唐时期（581—907年），与日本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及平安时代初期大体相当。隋唐两个统一王朝，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臻于完备，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疆域辽阔，交通发达，中国已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中央集权统治由初步建立进而得到巩固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阶段（特别是7世纪前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日本方面更加主动积极地向中国学习，遣隋使、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等等）的次数之多，人数之众，都令人惊叹；中国方面也热

情接待,予以种种照顾,并且也曾多次派人赴日,而鉴真和尚东渡的壮举更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与此同时,中国东北境内的渤海政权与日本之间的交往亦甚密切。尽管在公元663年发生了中日两国的第一次战争,但两国的邦交总的来说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以中国为榜样,通过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及其以后的仿唐改革,使其社会面貌发生巨变,封建制度迅速确立,“唐风文化”风靡列岛。总之,这一阶段的中日友好交往是盛况空前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

9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500年间,中国历经唐末战乱、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宋辽夏金元民族纷争融合各时期;日本则经历平安中期以后贵族政争、镰仓幕府专政、南北朝前期内战各时期。在两国都有战乱的同时,双方关系也出现了问题,蒙元进攻日本的战争和日本政府一度实行锁国政策都曾产生过不良影响。但是,在中日两国官方正式交往较少的情况下,民间贸易和人员往来却空前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发展。

中国明清时期(1368—1911年),与日本室町、安土桃山、江户和明治时代大体相当。明初至清代中期,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高度强化,封建经济高度发展,而且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日本虽曾有过长达110余年的诸侯割据局面,但其封建政治和经济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期间,曾有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和中国援朝抗倭战争等事件,但中日两国通过勘合贸易、信牌贸易和僧人学者频繁往来等各种途径,广泛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两国交往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宋元时期,形成了隋唐以后的又一高潮期。但是,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染指朝鲜和中国,直至挑起甲午战争,割占台湾,攫取巨额赔款和一系列侵略权益;此后又参加了八国

联军侵华战争，并与沙俄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大厮杀，从而将其魔爪伸入中国旅大地区。在中日关系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大批中国人东渡求学，形成了留学日本的滚滚洪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也在日本展开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于是，在清末中日关系的阴暗背景下出现了一幅动人心弦的画面。

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很快便被新老军阀的屠刀砍得七零八落，中国仍然积贫积弱，而分裂战乱又愈演愈烈。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步步紧逼。它抛出“二十一条”，妄图使中国变为已被其吞并的朝鲜第二；它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它发动“七七”事变，把战火烧向全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更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浪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经过多年浴血奋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也于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也给广大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不幸，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中插进了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珍惜两千余年传统友谊的广大日本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对日本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和凶残行径，也同中国人民一样，予以唾弃和反对，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两国友好关系的运动，在日本方面由潜流而趋于表面化，在中国方面则一向积极支持日本人民的努力，并且采取实际步骤不断扩大与日本方面的接触。尽管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横加破坏阻挠，但中日友好的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1972年9月两国终于恢复了邦交。从此，中日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几点主要的结论：

第一，中日两国之间虽有大海相隔，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开始交往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到二三千年的以前，而且友好往来日益频繁，友谊感情日益加深。

第二，7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一直是和平友好的；7世纪中叶以后，两国虽有兵戎相见之时，但和平友好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即使在没有正式邦交的情况下，双方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继续进行。

第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的文明发展水平存在着此高彼低、彼高此低的不平衡性和种种差异。两国人民都能主动地向先进的一方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古代日本受惠于中国的多，而近代则中国接受日本的影响较多。

第四，通过长期的密切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形成了许许多多共同点和极为接近的素质，特别是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科学技术乃至风俗习惯诸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五，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战则两害。同时，其利其害也必然直接间接地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

第六，只要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珍惜和发扬两千余年之久的传统友谊，正视和汲取几次战争留下的沉痛教训，相互信赖，共同努力，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就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历史证明，任何损害中日传统友谊和和平邦交关系的企图，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

二 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意义

广义上说，中日关系史属于国际关系史这一大学科的范畴。狭义地说，中日关系史是中外关系史这一较大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在发展历史科学和为现实服务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研究中日关系史也是如此。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首先，中日关系史研究如同整个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样，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一门学问。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朱杰勤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建立，必有一些国家同时存在，也就必然迟早会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中国也是这样。国家之间一旦发生关系，就必然互相影响，互相往来，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有时也会发生战争和边界问题。无论是和平交往，还是兵戎相见，都直接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危、民族命运。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无不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并且善于抓住当代中外关系出现的重大课题，追根溯源，探微求真，切中要处，总结经验教训，说明利害得失，为更好地解决当代中外关系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外交往和借鉴外国经验、吸收先进文化等提供可靠依据和参考意见。这样，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便成为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中国史学史上形成了良好的传统。

早在两汉时期，我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开始，涉及中日关系史的内容虽少，但也已在史书中出现。西汉时，匈奴势盛，严重威胁边境安全，并阻塞了丝绸对外贸易，汉朝政府因而展开了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和政治攻势。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专列《匈奴》、《大宛》诸传（包括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等有关诸国传）。其后，班固在其所著《汉书》中，专列《西域》诸传，也是为配合汉朝经营西域而作。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中日交往日密，史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也越来越丰富。唐代因佛教昌盛，与印度交往颇多，玄奘遂奉命撰

就《大唐西域记》。宋代与朝鲜交好，徐兢即写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元、明时期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来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日盛，于是便有赵汝适《诸蕃志》、汪大渊《岛夷志略》、张燮《东西洋考》等纷纷问世；而郑和七下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联系，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以及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等有关中外关系的著作，更如泉涌珠联。16世纪后期，中国防倭和援朝抗日期间，研究日本、朝鲜及中国与日本、朝鲜关系的著作又接连出现。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不断侵略中国北方，朝野人士对此密切注意，要求加强北部边防，制伏沙俄，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书的编写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沿海地区遭受英国等列强的侵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由是而出（参阅朱杰勤《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先人努力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优良传统，使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

其次，积极开展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促进中日友好邦交和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做好外事工作，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地理位置接近，相互往来已有2000余年，而且关系极为密切。近代以来，日本后来居上，中国则落后于日本，中日两国的师生位置发生了颠倒现象。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东邻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种种新变化一直密切关注，清末民初东邻日本的热潮历久不衰，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钜的影响”（谭汝谦、林启彦《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译

序》)。向学习西方有成效的日本人学习,使改造中国近代社会面貌的斗争得到了很大的促进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

20世纪的今天,中国早已不是从前的中国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长处学习。众所周知,日本现在在科学技术等领域有许多方面是领先于亚洲乃至领先于世界的,其现代化建设、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许多经验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注意。继续学习日本的长处,是我们中国人民实现“四化”宏伟蓝图之所必需。另一方面,中国要集中精力进行“四化”建设,必须进一步搞好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中日友好邦交是我国和平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总之,无论是继续学习日本的长处,还是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都需要认真研究中日关系史,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借鉴启迪,提高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避免错误和挫折。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中日友好关系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国人民间的相互往来和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逐年增加,两国政府间的交往也日益紧密。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两国政府成员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会议,两国在经济文化诸领域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两国许多城市互相结为友好城市,等等,都是令人瞩目的。现在,中日两国在“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四原则的基础上,正在为开创中日友好的新世纪而共同奋斗,“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已经成立。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和新的形势下,加强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一般学术研究的藩篱,它本身便是中日友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为了迅速改变我国学术界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长期落后于日本方面的不利局面(实际上整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缩小两国学术界在此领域内的差距,目前更有必要加强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

早在百年前,著名进步学者黄遵宪就曾尖锐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情况却仍然如此,或者说差距更大了”;尽管中国在研究日本,特别是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方面,曾经取得优异的成绩,也有一些持之以恒、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但总的说来,比日本确实要少得多,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广度方面,也远远不如”日本(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附汪向荣《后记》)。正如汪向荣先生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还刚刚起步;中国学者研究中日两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翻译出版一些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但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同上引文)。毫无疑问,国与国之间关系史的研究,是相关两国的学者们都要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共同的事业。但是,如果一方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另一方,便会带来种种不利因素,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与另一方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令人欣喜的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今天,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其中中日关系史研究团体的出现、研究队伍的逐步壮大和研究成果的增加以及与日本学术界交流活动的展开,都可以说走在前列。我们应该珍惜这一良好开端,发展这一好的形势,把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搞上去,也是完全可以搞上去的。

三 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主要途径

研究中日关系史，除了要及时了解和掌握不断出现的有关实物史料、长期流传的口碑资料以外，更要熟悉有关的文献史料。这些文献史料既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数量浩繁，涉及面广，从何入手呢？就初学者来说，首先应该对中国正史（包括《清史稿》）中的日本传和日本正史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史料有一个总的认识。

中国历代纂修的“正史”，除了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以外，就汇集一朝史事和编纂体例来说，《清史稿》亦应视为“正史”之一种。在这26种史书中，《史记》关于徐福东渡的事迹可能与古代中日关系史有关，《汉书》则明确记述了中日之间的通交关系和日本列岛当时的状况，但文字过于简略（仅19字），且仅附于《地理志》的“燕地”项下，未列专传；自《后汉书》、《三国志》以下诸史以不同名目列有日本传的凡16种17篇，篇幅或长或短，内容或详或略，不仅为研究古代日本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要研究8世纪以前日本阙史时代的史实，中国的有关史籍的记载可以说是唯一的文字依据），而且这些专传也成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必读文献，因为它们“完整地反映出两国之间在各方面相互影响和互补短长的事实，也记下了两国之间彼此依赖和斗争的史实”（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第3页）。

按正史的排列顺序（亦即各朝代的先后次序），16种史书17篇日本专传的具体名目是：《后汉书·倭传》、《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晋书·倭人传》、《宋书·倭国传》、《南齐书·倭国传》、《梁书·倭传》、《南史·倭国传》、《北史·倭传》、《隋书·倭国传》、《旧唐书·倭国传》、《旧唐书·日本国传》、《新唐书·日本传》、《宋史·日本国传》、《元史·